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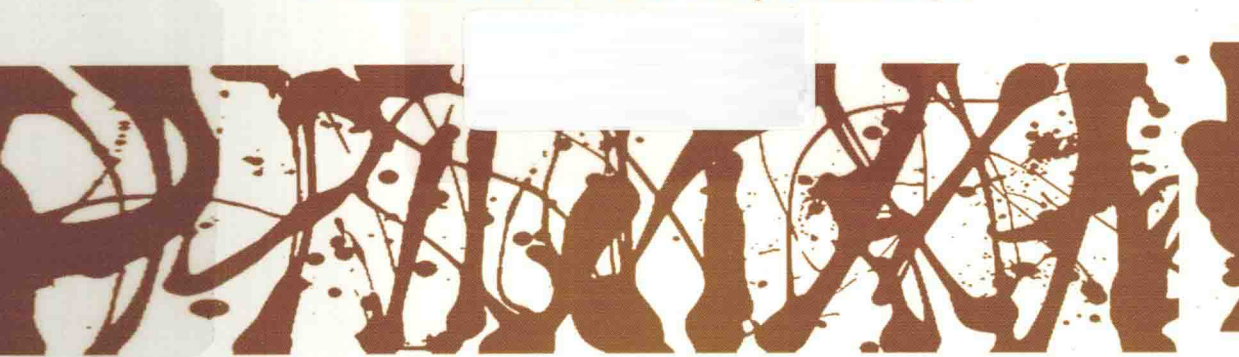
生命体验 与 艺术表达

陈忠实方言写作叙论

宋颖桃 王素◎著

Life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Dialect Writing of Chen Zhong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命体验 与 艺术表达

陈忠实方言写作叙论

宋颖桃 王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陈忠实方言写作叙论 / 宋颖桃、王素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161 - 9

I. ①生… II. ①宋…②王… III. ①陈忠实—小说创作—文学研究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55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陈忠实的方言写作 及方言写作之可能

冯希哲

宋颖桃和王素两位青年学人积多年思考和探索，形成了关于陈忠实方言写作的著作，不乏真知灼见，当庆当贺，然邀我做序，着实有点为难：一则，我对这个新的学术思维无深的涉足，恐难以知会其要旨；二则，学道浅薄，恐言之不当，有玷污美玉之忧。但谁又能拒绝真诚？盛情难却之下，姑且以私见求诸方家，代之为序。

陈忠实作为当代一个农裔作家，其成就集中在代表作《白鹿原》及“后《白鹿原》时期”的短篇小说和散论之中。如果用产量去评价作家的位置及其文学意义，陈忠实无疑难上榜；相反，如果用文学史本身内在的审美的和历史的尺度去确定作家的坐标及其文学意义，陈忠实在中国当代，乃至百年文学史中定然难以绕过。无论从文本的还是接受的角度去审视，《白鹿原》所指的丰韵性在这个时代尚难以阐述清楚，尽管解读的论著已近学科之盛。但是，不难看出，学界思维的视角多集中在《白鹿原》，客观上疏忽了创作主体与之作品的关联程度，淡漠了作家创作本身的个体经验发觉，这样的倾向不仅会忽略掉丰富创作论的价值，还将在读解作品的文化隐喻性上存有偏差，无论对于接受论还是文本论的固执己见者，都存在着致命的罅隙，也是学术缺憾。陈忠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

实生活的时空语境及其体认始终以关中为主场域，关中的风土人情很自然地进入到作品，并化为地域的以及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这也仅仅是表象，而深入骨髓的则是这方土地所积淀传导出的精神向度、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这或许是陈忠实方言写作的本体所在，也是作为方言写作现象研究需要甄别和深入的命脉所在。

本书的两部分显然是将陈忠实的方言写作现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作全面观照。宏观层面核心论述的是方言写作命名的可靠性和可行性，进而以纵横交错的视线切入到陈忠实创作的方方面面。而微观层面则从梳理作品表相入手，逐一归纳、解读、整合，对语言的社会性、语言接触等问题借鉴了实证的方法。一前一后，前面后点，相辉互映，彼此衬照，成一家之言。

实际上，本书最值得探讨，也是本书题眼的是方言写作这个学术概念，陈忠实的方言写作现象不妨看作经典案例。简而言之，作者首提的方言写作是否可能？内在结构有无价值？应作为学界关注和思考的新课题，也是本书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

于科学本身而言，命题无非来源于自然发现、思维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等现象。既成之为现象，即为学术之使命，学术之命题。方言写作现象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这个命名的必要性，也决定了话题的意义本体。实际上，方言写作并非当下新出现，自文学产生以来，即有源可查，有证可考。

粗浅地理解，方言写作既是一种地方语言的文人化应用现象，更是写作思维表达过程方言情趣与思维惯常介入的一种创作现象和存在。它是相对于官话写作、接受与传播而言的。如此创作现象，集中表现在小说、散文、戏剧等叙事文本或富有叙事传统的文本中，而作为诗歌，虽有之，但相比较其他文学体裁，特征并不显著，概唐宋后，文人化诗歌创作兴起，格律要求严格的必然。尽管如此，在唐宋诗中还是可以发现方言语汇或方言情调的深层痕迹。长期以来，对于写作问题的关注，学人倾注了相当的精神力量去关注文本的普遍性语义传达，对于客观存在的方言写作现象及其内在符号价值并未给予实在的应当观照，显

然,这是不公平的,是缺憾,无论是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还是现代文学的探讨,或者文学写作的语用修辞现象,或者对作家创作的内在思维惯性规律探究,都是不可漠视的研究对象。

就方言写作而言,现当代方言写作征象是最为清晰的。鲁迅笔下的绍兴话语,无论是散文作品还是小说,土味浓郁,乡韵十足。从“六斤”、“七斤”等阿字结构的人物命名,到《祝福》、土场风情的描绘,乃至隐藏于文本之后的浓郁的情感色彩,价值判断准则,都与童年和少年绍兴地方方言土语传统的熏染有着直接,或者说深入骨髓的关联。从1912年5月5日,到1926年8月26日离京,鲁迅在北京居住达14年之久,也身受“京味”熏染,而这一时期是鲁迅创作高峰期,先后创作了《狂人日记》和《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集,但审视文本,“绍兴元素”和“绍兴味”依然是主体风韵。由此细察,方言土语及其内隐的思维定式、性格,已被文化场的因子根植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外来的地域文化冲击与浸透力很难突破情结网织的童年堡垒。方言因素渗透在鲁迅文本中的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方言俗语、风俗习惯的表层,更深刻的影响层面是从熟悉的文化语境中所触发的情绪力量、创作欲望和特殊气质,以至于思考立场与思维习惯。地方语言文化系统由外而内,由内及外,内内外外,处于支配位置,稳固而深刻。鲁迅创作有如此规律可循,沈从文、萧红、萧军、茅盾等莫不如是。

专职文人的创作如此,移步到主倡大众化的“延安文学”时期则更为普遍。延安文艺讲话之前,“国统区”、“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会聚延安,虽然“国统区”文艺队伍文化程度较高,作家开始并不习惯解放区的“土味”,由此也发生了诸多的争论,但是源自“土味”的创作情调、方言写作的普遍性,及其包孕的非文人语汇所难道及的生动情态,也在磨合精神历程变迁中,触及到了习惯难以察觉的固执。延安文艺讲话所倡导的民族的大众的创作主张,最终在现代文学的“延安时期”使方言写作成为一种主流情态,随着进军东北和华北,方言运用的地域化特征不断随着战场转移而变迁,并惯性地影响到“十七年时期”。从赵树理、柳青、孙犁、丁玲、马戎等都可以看出此间的守成与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

变化，尤其是“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特征更为显明。

新时期以来，“京味”、“津味”、“海派”、“黄土派”、“湘派”，无论是自觉还是自发，都集束为地域色彩鲜明的作家群体。王蒙、王朔、刘恒、陈建功与北京方言，冯骥才与天津方言，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玉堂与山东方言，陈忠实、贾平凹与陕西方言，韩东等“南京青年作家群”与南京方言，方方、池莉、刘醒龙、姜天民、熊召政之与湖北方言等发生了潜在的方言背景关系，使作家创作的地域特征和关注的话题在方言所主导的特定文化场域里彰显出不凡的个性。现当代文学所组接的方言写作长廊是突如其来吗？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延伸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去梳理脉源。

中国文学可传之两个经典——《诗经》和《离骚》即有此传统。“风”与“雅”本身就来自于民间，自然打上了方言文化的烙印。据考，《诗经》的方言运用已普遍。“我心忧忧，念昔先人”（《诗经·小雅·小宛》）之“先人”，“月出皎兮，佼人僚（嫽）兮”（《诗经·陈风·月出》）之“僚（嫽）”，“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之“倩”就来自陕西方言，并且至今音义相同，而不单单是相近。从《诗经》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向度探索，文学的精神和力量在民间，其生命根植于民间。而《离骚》作为文人创作所具有的浓郁的楚风楚韵就毋庸讳言。

至唐宋，文人创作成为主导力量，《诗经》和《离骚》中的地域色彩，尤其是方言语汇使用频率弱化，但依然有迹可循。在此仍以陕西方言为例可证如下：白居易《二月五日花下》诗“闻有酒时须笑乐，不关身事莫思量”，王建的《秋日后》句“住处近山常足雨，闻晴晒暴旧芳茵”，柳永之《木兰花令》“不如闻早还却愿，免使牵人虚魂乱”，段成己之《行香子》“自叹劳生，枉了经营，而今一事无成，不如闻早，觅个归程”中的“闻”即为陕西方言之“趁”意，“闻早”即为“趁早”，至今陕西方言沿用。另辛弃疾《满江红》“层楼望，青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之“他谁”（即“谁”），苏轼《六月二十日望湖楼醉后书》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

船”之“白雨”(即“暴雨”),王安石《观明州图》诗“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之“投”(即“等”)等方言词汇入诗不仅具有普通话难以言尽之功用,更有情态逼真,合韵入辙之多妙。

至于宋元明清时期的话本、杂剧、小说等方言写作特征再次彰明,宋话本的题材、结构、方法、价值取向等直接影响到明清小说的文人画创作风格。而宋话本本以方言为主要表达工具,因此《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所呈现浓郁的地方方言色彩就不难理解,《金瓶梅》、《红楼梦》所洋溢着浓郁的方言韵味,也就在情理之中。戏曲本兴起于“勾栏”,唱词与唱韵之合曲与方言呈对应关系,即便文人创作进入自觉,戏曲曲辞都还是以方言为主。除京剧外,中国绝对多数的剧种都属于地方戏曲。可见方言创作影响之深刻程度。

上述观之,方言写作不仅是现当代文学显而易见的特征,更是中华民族多地域方言文化现象所产生的必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也体现出中国文学精神和形态中充分的民间性。只不过在文学更亲近于当下的现时代创作中,接受习惯所导致的错觉,人为淡漠了对方言写作现象的感觉,从文学文本所产生的经典化角度探考,陈忠实的写作,尤其是《白鹿原》完全可以作为典范来解剖,亦可起到管窥之效。

期愿此书能在方言写作现象的观照上,生发抛砖引玉功用之时,成为这个交叉学科深入探索的触媒。

目 录

上 编

引言	(3)
第一章 文化语境的变迁与陈忠实方言写作演变	(16)
第一节 1965 年至 70 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语境中政治话语的独白	(17)
第二节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启蒙语境中自发的方言创作	(22)
第三节 80 年代中期以后 ——多重文化语境交汇中自觉的方言写作	(30)
第二章 陈忠实方言写作的动因	(36)
第一节 乡土依恋与方言情结	(36)
第二节 中国方言写作文学传统的影响	(41)
第三节 关中方言:关中民间文化心理结构的符号 表征	(49)
第三章 淘采语言的智慧——陈忠实方言写作的策略	(57)
第一节 极富弹性的方言:形象化叙述	(57)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

- 第二节 作为生活语言的方言:生命体验的展示 (71)
- 第三节 作为民间语言的方言:个人视野的民间立场之
表达 (79)

下 编

- 引言 (91)

- 第一章 小说《白鹿原》对方言语音的运用 (95)

- 第一节 方言语音重叠 (97)
- 第二节 方言拟声词 (107)
- 第三节 方言儿化和方言谐音 (111)

- 第二章 小说《白鹿原》对方言词汇的运用 (118)

- 第一节 方言名词 (123)
- 第二节 方言动词 (131)
- 第三节 方言形容词 (140)
- 第四节 方言熟语 (147)
- 第五节 方言詈语 (157)

- 第三章 小说《白鹿原》中的民俗文化 (169)

- 第一节 饮食文化 (171)
- 第二节 服饰文化 (178)
- 第三节 娱乐文化 (183)
- 第四节 婚嫁民俗 (189)
- 第五节 丧葬民俗 (196)
- 第六节 其他民俗 (202)

- 第四章 小说《白鹿原》中凸显的方言精神和方言思维 (209)

第一节	方言语气词创造方言腔调	(210)
第二节	长句和排比句凸显方言艺术——秦腔的神髓	(219)
第三节	布局谋篇体现方言思维	(228)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39)

上

编

引 言

一 现代汉语·方言·普通话

探讨方言写作的话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关于方言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现代汉语、方言、普通话之间的关系。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口头使用的语言形式，是汉语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差异面。方言、普通话都是现代汉语的构成要素。

方言是各地文化最有力的继承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方言包括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两种。所谓社会方言，就是某一行业或某一组织的通用语，别的行业或组织没法以此与其进行交流。比如某些专业术语，专门用语，行业用语。所谓的地域方言是汉语在各个地方的地域变体，《现代汉语词典》将“方言”定义为“一种语言，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现代汉语词典》对方言的定义强调了它的地域性，这与方言的俗称“地方话”旨趣相同。我们所讨论的方言即是地域意义上的方言。汉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自古就存在方言分歧。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封闭的小农经济使得各地人民之间很少交往，语言上也渐渐有了隔阂，方言也就逐渐形成。

中国的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方言的地域划分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把汉语划分为七大方言，有人划分为八大方言，也有人分为五大方言、六大方言、九大方言。本文参照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

2006年9月出版的第九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手册，将方言按地域分为十大方言区：官方方言（北方方言）、晋语方言、吴语方言、粤语方言、湘语方言、赣语方言、闽语方言、徽语方言、客家方言、平话方言。各方言区还可以分为许多次方言（或称方言片），次方言下面又能分成若干小片。如果小片中的各个地点方言差异仍然存在，可以再区分为若干点方言。

在全国所有的地域方言里，有一种方言是各个方言区的人们都能够听得懂的方言，就是基础方言。北方方言覆盖的地域最宽，包括东北、华北、中原、西北、西南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面积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占汉语人口的70%左右，其余九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30%。北方各地方言的一致性也比较高，相距数千里而通话基本无困难，所以汉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而共同语（即民族共同语），是从基础方言发展起来的。它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共同语在春秋时代叫作“雅言”，汉代时称为“通语”，明清时代叫“官话”，民国时期又改称“国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确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为“普通话”。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1982年普通话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至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

《辞海》2000年第1版这样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等于北方话或北京话，因为它还吸收其他方言以及古代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成分，比任何方言更丰富、更完善。”同一本《辞海》无“现代汉语”词条。“普通话”既是规范、通用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就是被“普通话”规范之前并不通用的现代汉民族原生态的庞杂语言，包括普通话，以及尚未进入或

可能不会进入普通话而存在于普通话系统之外的所有语言因素，包括现在依然鲜活的所有汉民族的方言、外来语和古汉语，这些并不规范（未达标），区别于“规范普通话”的“大众普通话”。

生活中“现代汉语”和“普通话”这两个不同概念往往被不加区别地使用，这是因为人们有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现代汉语”会逐步被规范化为“普通话”，“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将来时和理论上的归宿。有的教材直接称“普通话”为“狭义的现代汉语”，就是这个意思。《现代汉语词典》除了收有少数和普通话有关（偶尔进入普通话、处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模糊地带）的方言词汇，其实就是《普通话词典》，负有规范“现代汉语”的使命，而与各种方言词典、古汉语常用词典和外来语词典并行。但这毕竟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和信念，“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在可见的将来还无法合一。

方言是“现代汉语”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普通话”吸收许多方言，但排斥的更多，被排斥的方言就留在“现代汉语”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广普通话，方言的话语权逐渐被削弱。在“普通话”强大压力下，方言努力维护版图，同时也明显收缩。但无论如何收缩，一些大的方言与普通话明显不同的部分，包括它们与普通话之间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细微区别，仍将长期存在。这就造成“国内双语并存”的局面。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在家庭、乡邻之间的私人场合说着方言，而在学校、社会等公共场合说着普通话。方言是家庭、乡土或区域语言，普通话是学校、社会语言。

一种语言，在口头使用的语言形式之外，还有与之相配合的文字书写系统。记录、书写现代汉民族的书面语叫“现代白话文”，这是以“现代汉语”和“普通话”为语言基础的书写系统。“现代白话文”如果严格以“普通话”为语言基础，自然是“规范的现代白话文”，但“规范的现代白话文”只有普通话水平很高的电台、电视台“普通话节目”正式演播稿以及权威报刊的运用文才算得上，不会大面积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代白话文”基本上是以“普通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

话”为基础，又从“现代汉语”吸取大量语言成分的不那么规范的“白话文”。“现代白话文”书写系统，分实用和文学两类。

方言在普通话压力下逐渐退缩的事实，被各种描述当代中国语言计划、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的论著所关注，但文学上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尽管普通话推广以来在文学领域就一直反对“滥用方言”，但作家还是拥有相当的自由。“现代汉语”与“普通话”之间有广阔的文学语言的选择空间，有着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方言语言资源。

二 汉语文学方言写作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一些在80年代卓有建树的作家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语言自觉，在方言写作方面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使得文坛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方言小说，方言写作可谓蔚为大观。我们很容易认出一部分作家的方言背景及其关联：比如王蒙、王朔、刘恒、陈建功与北京方言，冯骥才与天津方言，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玉堂与山东方言，陈忠实、贾平凹与陕西方言，韩东等“南京青年作家群”与南京方言，阎连科、李佩甫、乔叶与湖南方言，铁凝与河北方言，韩少功、彭建明、何顿、何立伟与长沙方言，方方、池莉、刘醒龙、姜天民、熊召政之与湖北方言。其中，陈忠实的带有浓郁秦腔秦调的方言写作现象尤为值得关注。从方言角度审视这位在当代中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创作之前，对方言写作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现状做一番考察是必要的。

所谓的“方言写作”是指在创作中较多地使用了地方话的文人写作，就是指他们（文人）在创作中从词汇、语法、语气、语感等各个方面大量地吸纳汉语方言话语资源，从而创造出一些具有独特的方言特色的文学作品。就目前中国文学现状来看，方言写作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狭义的方言写作，这类的方言写作，纯粹运用方言进行写作，运用方言进行思维，并且整个的叙事结构中都贯穿着方言的思维，如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和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等。第